

近现代广东人口迁移的特点(1840-1949)

郭秀文

[摘要] 广东向海外移民自15世纪就已经开始。广东人口的迁移,表现出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特点:一是大量向海外迁移,这是广东近代人口迁移最主要的流向;二是向邻省迁移,这主要是由灾荒、战乱和破产农民为生活所迫而引起的。近代广东人口的迁移,为移入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进步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键词] 广东;人口迁移;特点;海外移民

[作者简介] 郭秀文,女,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研究员。广东 广州,510050。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562(2007)01-0071-04

近现代中国国内、国际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化,战争、灾荒频仍,使人民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苦之中,这些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代中国的人口迁徙无疑与中国这样的大背景相关,本文就广东的人口迁移及其特点作些探讨。

一、广东人口的海外迁移

广东向海外移民自15世纪就已经开始,到17世纪晚期,在海外的华人已有一定的数量,但规模还比较小。中国人口大量迁移海外,是从鸦片战争后开始的。鸦片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由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而鸦片战争主战场的广东,社会和经济遭到的破坏尤其剧烈。据统计,鸦片战争造成广东的直接经济损失达白银1950万两,其中英国在战争中直接向广东政府索要666万余两,战后通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政府索取2100万两,广东又负担了其中的70%。战争期间广东政府支付兵饷449万两白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地方政府的财政损失相当于全省18年的地丁银收入。^{[2] p517} 战争使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经济受到破坏,农村破产,百业凋零,人民生活日趋贫困。再加上国内社会秩序混乱,人口压力日益加大,广大人民不得不逃离家乡,出外谋生。由于地理位置的便利,广东、福建人民便大批流徙外洋。“广东沿海各县,因无工可做,‘相率卖身

当猪仔,到南洋去当苦工者每年约以千万计。’”

^[3]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澳洲、美国西部金矿的发现,列强对南洋各殖民地的开发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自19世纪以来,西方各国要开发的中南美洲和南洋群岛等地,又出现了劳动力的危机。以上几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国大量的人口迁移到海外,迁出地区也已经不仅局限于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等地,通商口岸等也有人口迁出,但总的说来,仍然是以广东、福建、香港、澳门人口的迁移、流动为主。

早在1838年,英国商人就将大批广东台山人骗到了英属圭亚那、古巴等地。从1859—1875年,殖民者对华工的拐骗和掠夺达到高峰。他们在汕头、广州、香港、澳门、海口等地招收“猪仔”(契约工),这些契约劳工是人贩子从以上地方用拐骗、绑架等手段强迫签订卖身契约的华工,一般签订卖身的时间为5—8年。为方便运作,外国商人和中国的人口贩子在很多地方开设了收买和囚禁华工的机构,“在广州的为囤船,在汕头的为‘客馆’、‘客栈’,在澳门的为巴拉坑(猪仔馆)。”^{[4] p485} 他们在这些地区雇佣了一批地痞流氓来掳掠华工,然后再将拐掠来的华工贩运到国外。虽然近代以来中国被迫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它们在中国大量拐掠华工,开始时仍是不合法的。1859年10月27日,新任两广总督劳崇光同意了英属西印度派来的招工专员奥斯丁所拟的招工出洋章程5条,允许英国在广州设招工所公开招工,^{[5] p178} 这是

中国官方最早为殖民者提供的掳掠华工的合法依据。此后，英国、法国及西班牙先后在中国成立了招工所并开始招工。到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其中规定准许英、法等国招募华工出国，从而把在中国掳掠华工这项罪恶彻底合法化，使得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中国劳动力的行为更加猖獗。根据英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在广州及附近被掳掠的出国华工，1849年有900人，1850年有3118人，1852年上半年有15000人。^[6]汕头1855年出口华工有6388人，到1858年，从汕头被掠出国的华工有40000多人。澳门1856年—1873年（缺1861、1866年）出国华工有181563人，平均每年有11347人。香港从1855—1872年，平均每年出国华工有12872人。据统计，19世纪50年代仅从广州、汕头、香港、澳门出国的华工，每年就约有50000人左右。1876—1898年，琼州（今海口）前往东南亚的华人有344698人，其中大部分为华工。^[4]^{p487}1846年，西班牙在福建厦门贩运了第一批华工。到1852年，从厦门被贩运出国的华工在8000—15000人之间。^[2]^{p57-58}19世纪中期，美国西部发现了金矿，大批华南华工被诱骗或胁迫到此地开采金矿，至1882年到达美国西部的华工约有29万人。此外，美国修建铁路亦招募了数万名华工。

1893年，清政府废除了歧视性禁律，开始允许华侨回国置业并可以随时出洋经商，华侨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这一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增加了华侨的人数，据统计，“光绪前期全球华侨有300万，到宣统三年（1911）达到630多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洋再掀高潮，民国二十七年全球华侨已有920多万。”^[7]

这些出国的华工，多是被拐掠的强制性移民，只有少部分是因生活所迫的自由移民。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强壮的劳动力，只有少部分是未成年的男童。他们在出国途中就受到非人的对待和野蛮的镇压，到了国外仍然遭受着比奴隶还悲惨的虐待，令人发指。据统计，1847—1877年到古巴的华工总共有12008名，但被折磨致死的却有三分之二。^[5]^{p244}华工用鲜血和生命为侵略者创造了无法估算的利润，为他们带来了暴利，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虽然清朝的统治已被推翻，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政局一直动荡不安，人民生活仍然极度艰辛困苦。尤其是到了20世纪30年

代，广东等沿海省份仍是多事之区，不仅战争连年，而且多次发生灾荒，加上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低下。在这种情况下，广东又出现了向海外迁移流动的高潮。这一时期移民的去向主要以南洋为主，每年都有数十万人，其中广东人约占三分之二以上。“仅马来半岛一地，每年出入口岸数对比，新增加的华侨人数约有10万人。1926年竟超过20万人。1912年由汕头至泰国的华侨有14.3万多人，1911—1914年由海南岛海口移至新加坡的华侨有8.9万人。从1925年—1926年，两年内我国移入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华侨有五、六万人左右。他们大部分是广东的客家人。”^[8]^{p61}1929年后，由于南洋经济衰落及一些国家实行排外政策等原因，流往东南亚一带的华侨开始减少，但并没有中断。据统计，20世纪50年代的华侨总人数约为1200万人，而广东就占了其中的68%。

这一时期出国的华侨多是失业和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以成年男性为主，妇女和儿童只占很小的比例。以1926年移入新加坡的华侨为例，总数有348593人，“其中，妇女为49896人，约占14.3%；男孩为34023人，占9.7%；女孩为11795人，占3.4%。”^[8]^{p62}在妇女和小孩中，广府人最多，其次是客家人，再次是潮州人、海南人和福建人。广东的迁出人口遍布全省，尤其以下三个地方为多：韩江流域的潮汕平原和兴梅地区；珠江三角洲，主要包括台山、中山、新会、开平、恩平、宝安等地；海南岛东部，包括文昌、琼海、万宁等地。

二、广东人向邻省的迁移

由于广东地处中国的最南端，自然条件相对恶劣，民俗习惯又与中原大异其趣，属于所谓的蛮荒之地，尤其是南岭（五岭）把广东与中原分隔开来，既影响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人口的迁移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阻碍。直到唐代张九龄主持开凿了大庾岭山路后，这一状况才逐渐得到改变。但是，在近代以前，除了宋代出现过中原人口较大规模南迁和明清时期广东人口向四川迁移以外，广东的人口迁移流动较少。直到近现代，由于自然灾害、战乱及农民破产等原因，才导致了广东人口向邻省迁移流动。

（一）灾荒导致的迁移。

这里所说的灾荒主要指各种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水灾、风灾、虫灾、地震、瘟疫、饥谨等。

我国有记载的历代各类自然灾害的数量是惊人的。据统计：“自西周至民国二十六年 3034 年的历史时期里，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不论灾情轻重，共计 5245 次，平均每年 1.73 次。其中，旱灾 1066 次、水灾 1053 次、地震 705 次、风雹 550 次、风灾 518 次、虫灾 482 次、饥 407 次、疫 261 次、霜雪 203 次。”^[9]而在清朝 296 年中，共发生灾荒 1121 次，每年平均 4.2 次，其中旱灾 201 次、水灾 192 次、地震 169 次、雹灾 131 次、风灾 97 次、蝗灾 93 次、歉饥 90 次、疫灾 74 次、霜雪之灾 74 次。^[9]从民国成立到民国二十六年（1912—1937 年）间：“各种灾害之大者，统计其频数，竟亦达七十七次之多。计水灾二十四次，旱灾十四次，地震十次，蝗灾九次，风灾六次，疫灾亦六次，雹灾四次，歉饥二次，霜雪之灾二次。且各种灾害，几皆同时并发，杂然纷呈。”^[9]而日本学者左藤武敏综合《清史稿》各卷的有关记载，对 1840 年到 1911 年社会灾荒的统计表明，在这 61 年间，全国总共发生各种自然灾害 1354 起，每年最少为 5 起（1891 年），最多为 35 起（1887 年），平均每年 22.36 起，每月将近有两次，其中每年 20 次以上的（含 20 次，下同）有 26 年，30 次以上有 5 年，10 次以下的有 5 年。^[10]民国时期（数据统计从 1911 到 1937 年）共发生 77 次，平均每年有 2.96 次。^[9]据统计，广东省从 1840 年到 1919 年的 80 年间，共发生各种灾害 1919 县次，其中，水灾为 510 县次、旱灾 242 县次、风灾 344 县次、地震 207 县次、虫灾 271 县次、冻灾 110 县次、雨雹 136 县次、饥灾 99 县次。^[10]换句话说：“每年平均约 24 县次，依次为（年均）：水灾 6.4 县次、旱灾 3 县次、风灾 4.3 县次、地震 2.6 县次、虫灾 3.6 县次、雨雹 1.7 县次、饥灾 1.2 县次。我们在翻阅有关的历史记载时，在广东省几乎找不到自始至终风调雨顺的一年。”^[10]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根据政府公报及各种报刊的直接材料），在清代后期和民国时期比较大的、涉及到广东的灾荒主要有：1877 年，水灾；1912 年，大水；1914 年 7 月，水灾；1915 年，大水；1918 年，大水同时发生地震；1922 年，汕头飓风，死伤人数万；1923 年，1924 年，大水；1925 年 3 月，虫灾；1928 年，旱灾；1932 年，水灾；1933 年，旱灾；1934 年，风灾，房屋倒塌无数；1935 年，水灾；1937 年，广东省瘟疫流行，广东定安县鼠疫死者不计其数。^[9]从以上不难看出，在近代中国 80 年的岁月中几乎每年都有大半个中国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侵袭之下；无论是从整体上看，还是从局部区域看，还是从灾荒的类别上看，用“十岁九荒”甚至用“无时

不在”来形容灾荒的频发，是绝对不为过的。^[10]灾荒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巨大的，往往会导致民不聊生，甚至大量人员的伤亡。为了生存，幸存者只得背井离乡，远走他方。

据史书记载，我国因为灾荒导致的迁移流动，早在商朝就已经开始，到了近代仍然有增无减。一般来说，灾荒的程度越严重，人员的迁移流动率也就越高。从近代各重要都市人口激增的情况也可以看出灾荒所引起农民迁移流动的人数之多，如“广州人口在民初仅八十万左右，今（1937 年）亦增至一百余万”。而“我国都市人口，死亡率常超过生殖率，此巨量之增加，其主要原因，显非由于自然之增殖，而系由于农村逃荒人口之移集。……我国农村人口移集都市最主要之原因，即为灾荒。”^[9]

（二）逃避战乱的人口迁移。

沈益民、董乘珠指出：“人口迁移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从我国数千年的人口迁移历史看，引起人口迁移的最基本的动因在于经济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人口迁移也经常受到政治因素的强烈影响，尤其是战争”^[9]的确，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它使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生活无着，迫使人们向相对安全的地区迁移流动。1851 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波及到长江及黄河流域的许多省份，对沿线的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也引起了这些地区的人口流动。太平军从广西进入湖南以后，湖南南部大约有 5 万多人加入了太平军。从此，参加太平军的人员也由多为客家人转变为多个省份人员共同参与的运动。在太平天国所实行的“男女馆”制度，即实行男女分居制度时，各个“男女馆”形成了一个移民点。谢介鹤在论及南京“男女馆”中各省的人口时说：“其时男馆，广西约千五百人，广东约二千九百人，……。女馆广东、广西约二千五百人，……。”^[11]可见直接参加战争的迁移人口已不在少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侵占了东北、华北、华东、华中以及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大批工厂、学校、机关及居民迁移到了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处抗战后方的省份。广东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州、汕头、南海、宝安及海南岛等地相继沦陷，各种工业陷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经济困难，物价高涨，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有大量的人口死亡，幸存的则大量流向内地，致使广东各地人口数量锐减。比如顺德、南海等地的人口，到战争结束时，仅为战前的三分之一。即使在未沦陷区，由于国民党政府税收名目繁多，使百姓不堪重负，再加上

土地大量集中到地主、富农手中,迫使农民流离失所,向外迁移。“据连县19个村调查,1937年19个村的离村人数为187人,到1940年增至501人,为三年前的2.6倍。其中除38.7%是被拉壮丁充兵役外,多数乃因生活所迫而流离他乡。”^{[8]365}

(三)破产农民为生活所迫的迁移。

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加上人多地少的矛盾日趋激烈,使得大批农民生活无着。为了生存,为了逃避各种苛捐杂税,大批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迁移到异地他乡。广东的破产农民主要流入邻省,如广西、四川等地。

广西在南宋时期已经开始有移民流入开垦,从清代开始,湖南、广东、福建各省陆续有农民移入广西,其中尤以广东、湖南两省农民为多。由于大量汉族人口的流入,广西的居民结构也开始改变,由以“土著恒多”的少数民族人口居多逐渐演变为以汉族人口为主的地区。“据咸丰元年(1851年)严正基的记载,广西省原有土著居民约十分之三、四。柳州府、安庆府、桂林府、平乐府湖南人移入最多,广东人次之,福建人较少,梧州府、浔州府、南宁府、镇安府、郁林府、广东人最多,也有福建人。在雍正、乾隆年间,从嘉应州(广东梅县地区)移入浔州、郁林一带的客家人,至道光年间,成为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力。”^[12]总体来说,从外省流入广西的农民中广东人占了绝大多数。根据20世纪30年代广西省政府的统计数据,广西有62.77%的居民讲白话,有19.15%的人讲客家话,两项合计比例为81.92%。^[13]根据黄滨的研究,若排除其中可能存在的双语、当地娶妻等成分,那么可断定广东移入广西的汉人及后裔当占广西总人口的过半比例,以宣统二年(1909年)广西人口调查的标准人口数896.7629万人,按50%比例折算,广东在广西的人口至少有4483814人。^[14]他们穿越广西,抵居流域上游的滇黔,如昆明和贵阳,广东人聚居营生众多,都形成了热闹和长直的“广东街”。广东移民数量如此巨大,致使广西人口稠密地区从过去的桂北逐渐转到最靠近广东的桂南和桂东南。^[15]

三、结语:广东人口迁移所产生的影响

近现代广东的人口迁移流动促进了广东与其他省的经济文化交流,为迁入地的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以广东为主的中国海外移民,为移入国家的经济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在马来西亚,最早从事采锡和种植橡胶并成功的都是来自广东、福建的华侨;1819

年,英人来佛士占领新加坡时,岛上只有华侨30人。到1860年,华侨增加到50043人,占全岛人口的66%。1901年,岛上华人人数已达22万人,占全岛人口70%,其中除福建人外,绝大部分是来自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兴梅地区和海南岛的人。^{[8]172}这些人对新加坡的开发建设起过重要的作用。其他如泰国、越南、古巴、美国、墨西哥、新西兰等国家的甘蔗种植业、碾米业、铁路建设、石油开采以及采金业等等的建设,也都与福建、广东等地华工的汗水和劳动密切相关。这些移民同时也促进了中国对世界各国政治、文化的了解,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和沟通,对中外文化交流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 [2] 参见李春辉、杨生茂主编《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22页,转引自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
- [3] 郑甫弘、熊蔚霞《海外移民与近代闽粤侨乡社会观念的变迁》《八桂侨史》1995年第2期。
- [4] 蒋祖缘、方志钦主编《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
- [5]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 [6] 《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页。
- [7] 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 [8] 朱云成主编《中国人口·广东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4月。
- [9] 数据统计资料来源于邓云达所著《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转引自沈益民、董乘珠《中国人口迁移》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8月。
- [10] 转引自刘仰东《灾荒:考察近代中国社会的另一个视角》《清史研究》1995年第2期。
- [1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655页。
- [12] 田方、陈一筠主编《中国移民史略》,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6月,第116页。
- [13] 统计数据参见民国二十四年《广西年鉴》第二回。
- [14] 参见黄滨《明清时期广西的“无东不成市”的布局研究》,《广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三期,黄滨《近代广东商人与广西城镇经济的发育》《桂海论丛》1992年第三期。
- [15] 梁钊、陈甲优主编《珠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概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163页。

责任编辑:李玲